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文化诠释

◎ 林 剑

内容提要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学者曾经有一个疑问,中国古代在技术上一一直都是领先于欧洲的,但创造了四大发明的中国却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是何原因。前些年,钱学森先生在逝世之前也曾发出过这样的追问,我们的科技与教育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与学术大师,在大师的培养方面,我们甚至还不及民国时期。学界将上述的疑问与追问概括为“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对上述难题与疑问学界已有不少思考,本文试图从马克思历史观提供的思路,进行一种新的诠释,即文化传统的诠释。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没有产生群星灿烂的科学与学术大师,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具有保守性,而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又是由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保守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 难题与疑问 文化传统诠释 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归因

(中图分类号)B03;B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01-06

DOI:10.15895/j.cnki.rwzz.2017.12.001

英国人李约瑟是长期关注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热情及其研究所达致的深度与成就及影响,不仅在西方人中是鲜见的,即使是较之于中国学者而言,成就也不逊色。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尤其是对闻名世界,并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的肯定与赞赏的评价是独具慧眼的。然而,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给予中国人的不仅仅是骄傲与自信,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与留下了一些挥之不去、避之不开,引人不得不思的疑问,其中的一个便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是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

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比西方有成就得多?”^①李约瑟的两个为什么既似疑问,更似追问,这种疑问和追问,要求人们思考与解答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为何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与文明的中国与印度,尤其是创造了四大发明的中国,在近代以降的历史时段中,在现代科学的发展方面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方,而且根本没有生长出具有真正意义的现代科学?面对李约瑟提出的上述疑问与追问,国内外学者作过不少思索与探讨,人们试图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解答,并力求给予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研究与试图解答李约瑟疑问的学术论文与学术论著日趋增多,但几乎没有一种解答能够获得相对多

^① [英]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刘纯、王杨宗主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论著选》,徐钱庄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数的认同,更不用说普遍与一致性的认同。基于此,美国学者肯尼思·博尔丁将李约瑟的由两个为什么所构成的疑问与追问称为“李约瑟难题。”

其实,类似于李约瑟式的疑问与追问,或类似于李约瑟的看法在中国学界并非难觅。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就曾在分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时,先于李约瑟指出,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大大地落后于西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代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而西方近代以来之所以超过中国,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他们创造出了发达的自然科学,这种发达的自然科学成为推动西方社会发展与兴盛的重要推力。^①尽管冯友兰先生的上述看法,与“李约瑟难题”的旨趣所指并不完全相同,一个试图解答的是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一个试图追问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类似西方的自然科学,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所论及的问题之间是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的,“李约瑟难题”所关涉的实质上是冯友兰先生所探讨的前置性问题。如果说,上述冯友兰先生所论及的问题与“李约瑟难题”在旨趣指向上还存在着某种差异的话,钱学森先生在逝世之前所发出的追问,即被中国学界冠之以“钱学森之问”,无论就其追问的形式看,还是就其所及问题的实质看,不仅是形似,而且是神似。钱学森之问所追问的是,新中国的诞生已超过半个世纪,虽然我们在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与涌现出具有影响力的科学与学术大师,我们不仅没有造就出有重大影响力的类似于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样的科学大师,在科学与学术大师的造就方面,我们甚至还逊色于贫穷、落后的民国时期。中国为何没有造就出大批的科学与学术大师?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科学与学术大师的造就与涌现?这的确是一个引人不得不思、不得不虑的问题。“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一个追问中国近代为何没有生长出自然科学,一个追问当代中国为何没有生长出科学与学术的大师,二者之间的关联度与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二者的目的指向都在于以疑问与追问的形式,引发人们对阻碍科学发展与大师成长的环境与条件的思考。

自“李约瑟难题”产生以来,尤其是“钱学森之问”公布之后,再次激发出学者们对“李约瑟难题”

与“钱学森之问”的谜底进行破译的热情,产生了不少值得关注与重视的见解。有人试图从哲学上去破译“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谜底,认为中国哲学发展中缺乏形而上学阶段,而形而上学对自然界的发展进行分门别类与量化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得以生成和获得进展的重要环节。^②然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史与形而上学生成史的真实关系却表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与其说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生成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生成与发展的结果与必然表现。有人试图从中国语言与文字所具有的特点去解读中国近代以来在科学方面落后的原因,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的特点具有极为明显的象形性质,以形示意与以形喻意的语言文字虽有益于形象思维的发育与培养,却不利于抽象的逻辑思维的形成。^③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属于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发现,因此,中国古代的领先主要是一种技术的领先,而不是科学的领先。技术的发明主要依赖经验的积累与感性思维,而科学依赖的主要是抽象的逻辑思维。西方近代以来科学发达的民族与国家,使用的大多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具有抽象化的特点,因而有益于人的逻辑思维的培养与形成。但这种以语言文字的特性去诠释中国近代以降的落后与科学大师的缺乏,既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同样是使用字母文字的民族与国家在西方近代以前的古代与中世纪,在科学的发展方面并不比中国优越,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在西方也是17至18世纪以后的事情,也不能合理地诠释,深受中国语言文字影响,并以汉语为基础而形成自己语言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科学发展水平却远远超出我们,即使是在二战后的阶段,以诺贝尔获奖者为标杆的科学与学术大师也远远领先于我们。也有人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去诠释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落后的原因,认为落后的自然经济或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专制的政治统治是阻碍中国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理论生成与导致科学发展水平严重落后的根本

① 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9页。

② 参见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2014年第2期。

③ 参见宋礼庭《论李约瑟难题——基于中国文字的视角》,《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原因。这样的诠释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近代以来在科学上崛起的民族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但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对科学生成与发展的作用 and 影响也只能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并不是作用与影响科学生成与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因为,即使是在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大致相似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其科学发展的状况与水平也并 不完全一致。近些年来,不少人开始将反思的目光聚焦在我们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上。教育是科学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通常决定着科学发展的状况。在一些人的视野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之所以取得了长足进步,是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但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科学大师与技术巨匠的涌现方面却明显地逊色于我们科学发展的总体状态与水平。人们普遍认为,当代中国之所以没有造就出群星灿烂的科学大师,是与我们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紧密相关的。我们的教育重知识的教授,轻能力的培养;重学生的考试分数,忽视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思维的关注,其结果自然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高分低能的,是考试的巨人,创新的矮人,而科学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应该说,人们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是有根据与理由的,正是由于这种根据与理由的存在,我们的教育改革才成为必要与必需。但我们的教育为何重分数,轻能力;重知识,轻创新,我们为何没有培养出群星灿烂的科学大师,是否还有更深的原因?值得深思。

学界对“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解码与试答还在持续,且思考的视野日渐广阔,但有一点似乎被人们忽视了,至少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科技发展和该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

二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尽管存在着大小之别,强弱之分。我们首先应确认或肯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科学技术的生成也好,发展也好,其状况与水平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应从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去获得根本性的解释,但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对该民族与国家的科学技术的生成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

不可忽视的。创造过四大发明的中国为何没有生长出现代形态的科学?在世界科学发展史的壮丽画卷上,为何鲜见有中国人的名字位列其中?为何当代中国,我们的学生呈现出高分低能的特点,人数众多的考试状元、奥赛王者能成为学术大师与科学巨匠的却稀若晨星?其中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与复杂的,但本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保守性基因的作用难辞其咎。

广义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应包括中国五千年文明所生成与积累而成的全部文化。但就其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大小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的应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或作为表征符号的文化。理由是,其一,儒学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存活的时间最长。虽然儒学并不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源头,在儒学诞生前,中国文化的历史存在已超过两千多年,而且与儒学同时并存和与之竞争的还有诸子百家,但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儒学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及与儒学相互竞争的文化,大多数要么被儒学改造吸纳被融入与包含在儒学之中,要么在与儒学的竞争中因失败而式微或消失。对于近代以来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尤其是普通大众来说,不要说通晓诸子百家,即使是能知晓几家名称的人也较难觅。其二,自汉武帝采纳董仲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的两千多年的历史跨度中,虽屡经王朝更替与历史变迁,但在整个封建时代,儒学与儒家文化始终处于一学独尊的统治地位。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虽上演过扬佛抑道或扬道抑佛的剧目,但始终不存在扬道而抑儒,扬佛而抑儒的情况。儒学与儒家文化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通常都处于统治地位,这表现在,儒学经典既是官学的指定教材,而且也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构成社会法律与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与根据。

儒学与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受到统治阶级的呵护与推崇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逻辑,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文化最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不能以儒学与儒家文化曾经是中国农耕文明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而诉诸拒斥与否定。儒学与儒家文化相对于农耕文明的历史时代来说它不仅曾经是必然的、合乎时宜的,而且曾经也是先进的,中国在农耕文明时代的历史辉煌与儒学和儒家文化的发展



具有不可否认的关系,或者说儒学与儒家文化对中国农耕文明时代的文明发展功不可没。儒学与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它是中华民族文化演进的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既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气质的塑造,也影响着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儒学与儒家文化生成于中国的农耕文明时代,它对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儒学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现代科学的落后也负有不可忽视的责任。虽然在以儒学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类似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样的提倡革故惟新的思想,但就其总体倾向与文化气质而言,其文化的崇古、恋旧、保守的色彩更为浓厚。儒学与儒家文化在更多时候主要强调与突出的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学而优则仕”等一类的文化观念。即是说相对于对革新与创新的提倡而言,儒学与儒家文化更表现为对信古、好古的看重,强调的是对前人、古人思想的述,而不是作,是学而不是思,是“学而优‘则仕’”,考而优则仕,而不是思而优、智而优则仁、则贤。或者说,儒学与儒家文化重视的是对儒学经典或对前人、古人、贤人、圣人已有思想的学习与记忆、固守与重述,轻视文化的思考与创新。在以儒学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中,与强调“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相联系或互为支撑的另一个文化传统,即“考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与“考而优则仕”虽然二者强调的着重点稍有区别,一个着重于人才的培养,一个着重于人才的选拔,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且二者是相互支撑的。对于力求入仕者而言,学而优的直接目的也许是为了考而优,对于社会或统治者而言,考试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选拔出所需的人才,也蕴含着以考促学的价值取向。科举取士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选拔官员的根本性制度,历经千年以上的历史而不断不衰,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科举作为一项选官取士的考试制度,其本身无可厚非,也不乏积极意义,它至少在形式上为一些出身低下的寒门学子提供了改变社会地位的潜在可能性,即使是在现代社会,考试制度也是人才选拔与考核的一项重要制度。但问题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基本遵循的是儒学的文化传统,其考试的内容与要求是儒学的经典与对经典的诠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六经注

我”还是“我注六经”,其出发点与关注的核心都是对前人、古人、贤人、圣人的圣言、圣训、圣经、圣典的学习,其目的是使人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尊圣人之道,崇祖宗之法。以儒学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重学轻思、重述轻作的文化传统,虽然有益于传统文化的记忆与守护、保存与传承,但不利于人们创新思维的养成,不利于文化的创新与革新,更不利于现代科学的生成与生长。诚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科学的生长与发展也离不开已有的知识作为出发点与基础,但科学的本质不是对已有知识的记忆与尊述,而在于对未知领域的思考与探索,因而科学的生长与发展是一个从已知到未知、不断超越已知的过程。科学的发现是需要反思、批判、探索精神的,而不仅仅是对已有知识的学习、记忆与掌握。当我们弄清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传统的精神气质,我们或许就能明白,曾经创造过四大发明的民族为何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上却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就能明白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独创出状元这一称号,并选拔出七百多个状元的民族,却少有人在学术上,尤其是在科学上作出过与状元称谓相匹配的业绩。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在中国的当下,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学富五车、说文解字式的博学鸿儒,但缺乏卓有建树的思想家与科学家。时下,不少人对中国的教育多有诟病,批评中国学生重考试、会考试,但许多学生是高分低能,我们的学校能培养出懂牛顿、爱因斯坦科学理论的人,却培养不出类似于牛顿、爱因斯坦式的人。为何如此,不能说与我们的文化与教育传统没有关系。我们或许不缺学者,但缺少的是具有探索精神的学问家,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恐怕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看重与习惯的是学,而不是问,是述而不是作,是已知,而不是未知。

三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儒学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学轻问、重学轻思、重信轻疑、重述轻作或述而不作,好古、信古、崇古而薄今的带有浓厚保守主义的文化传统呢?这种保守主义文化传统的生成与延续究竟是自然性的因素所致,还是历史性的因素所致?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合理性的解释应是,它是历史性的因素所致,而非自然性的因素所致;它是必然性的历史表现,而非偶然



性的历史表现。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创造性的资质与天赋,孔子及其创造的儒学与儒家文化本身即是中华民族思维创造性的表现与证明。只是由于儒学所崇尚的一些文化观念,导致了一种保守性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保守性特质的文化传统的形成,确实不利于创造与创新性文化精神的生成与发挥。以儒学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保守主义特质,并且这种具有明显保守主义特质的文化还能长期地居于一学独尊的统治地位,内化为一种稳定的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与文化传统,决非是某种偶然性因素所决定的,而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确切地说,它是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必然表现。

文化与文化传统是生成的,因而是历史的,而不是天赋的。任何一种文化与文化传统都是一种有根的存在,不是无根的浮萍,而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根是植于一定的社会与历史的土壤之中的。一定的社会与历史的条件与环境即是社会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土壤,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必然性地会生成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文化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条件与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有机体,单一的社会因素构成的社会是不能称之为有机体的。因此,一个社会的文化与文化传统也是由多种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生成的。文化与文化传统不具有先天的性质,而是历史性的生成,具有被决定的性质,一个不争的历史性的经验事实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切民族与国家,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或大致相同的条件与环境的基础上便会生成大致相同的文化观念与文化传统,这便是文化不具有自立与独立性的决定论证。如上所述,决定或影响文化与文化传统历史性生成的因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多种因素中起根本性作用的因素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深刻的原因在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

其实,守旧崇古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独有气质,而是处于以手工工具进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具有的普遍气质。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农耕社会的土壤中没有生长出来,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欧洲,当它还处在农耕文明的历史时代时,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

科学。在欧洲近代以前的中世纪,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跨度中,不仅没有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且在技术的发明与发展方面,甚至是大大地落后于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是欧洲,但现代科学在欧洲的生成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具体地说是17、18世纪的事情,而这时的欧洲已经处于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了。当欧洲已进入到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资本主义时代时,中国仍然延续着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历史。当我们弄清了现代科学在欧洲生成的历史时代以及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或许就不难明白,在中国近代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为何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一个合理的解释也许是,中国仍处于以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而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具有天然的保守性质,这种生产方式与交换的保守性质,既限制了人们探索的视野,也压抑了人们创新的动力。

那么,以手工工具进行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为何具有天然的保守性质?导致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具有保守性质的根本性原因又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论及资产阶级为何能走过非常革命作用的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农耕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保守性也许是有启发性的。他们曾明确地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②资产阶级为何曾经能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深刻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③所谓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当然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工业阶级。其实,“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不仅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75页。



资本主义以前的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其他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深刻的原因在于,在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经验与技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生产的任何变革,都意味着原有的经验与技能所具有的价值丧失,手工业阶级要想维持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恶化,只有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不发生变化,否则他们的生存条件便会受到威胁。在农耕文明时代,人类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有过进步的,即使是在被人们称为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是有过进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进步与变化是极缓慢的,缓慢得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保守性的生产方式必然生成保守性的文化与文化传统,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弄清了这种历史发展的逻辑,人们也许就明白,为何在农耕文明时代生成的文化传统中,信古、好古、尊古、崇古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历史观,而非某一民族文化的独有现象;同时也不难明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首先诞生于资本主义率先发展的欧洲,而不能诞生于曾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文明的中国与印度。现代科学的田园属于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欧洲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因为资产阶级要维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生存地位,就必须使自己的资本不断地进行增殖与扩张,因而必须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进行下去。”^①正是在对生产工具进行不断革命需要的驱动下,现代科学才得以逐渐地发展起来。现代科学首先生成于资本主义的欧洲,这决不意味着唯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土壤才适合现代科学的生长与发展,但可以确认的是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保守性的文化传统的土壤的确不能生长出现代科学。这也许是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的民族与国家缺乏现代科学生成与发展领先的历史例证的合理解释。

以农耕文明生产方式的保守性去解释中国文化与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并以后者去进一步诠释中国近代在科学方面的落后似乎还无法彻底地解释人们心存的下述疑惑。人们难免要问,以追求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远离我们近一个世纪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也已近70年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向科学进军的高潮,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科学的现代化提高到立国之本的高度,人们对科学的热情与推崇甚至

有超过西方,为何我们仍然没有造就或培养出能在科技史与思想学术史上留下不朽英名的科学与学术的大师呢?考试的状元为何少见成为科学与学术的状元呢?难道还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吗?诚然,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今天的发展水平已不是19世纪可以比拟的,中国已不再是科技发展的弱国,但若看中国教育发展中的问题,看中国学生中仍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再看看我们的学界在科学与学术研究上大多是照着讲、跟着走,较好的情况也只是接着讲的习惯与现象,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与改造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传统仍然在阻碍着我们的科学与学术的创新与发展。因为,当人们只是习惯于照着讲与跟着走的时候,有可能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或学者,却很难成为学问家与大师,即使是那些能接着讲的人们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只有那些具有创新与开拓精神的人们,善于创新性地转换思路进行思考并作出原创性的成果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大师。虽然一定的文化与传统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环境,且归根到底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相联系与相适应的,随着社会历史条件与环境或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改变,社会的文化观念与文化传统终究要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通常需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性的过程。因为一种文化传统,无论是好的文化传统,还是坏的文化传统,传统一旦成为传统,或者说传统一旦转变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此民族的文化性格时,通常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巨大的历史惯性,要改变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现代科学的发源地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欧洲,但欧洲的现代科学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同时产生的,现代科学生成的历史比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晚了至少两百多年,这一事实表明,克服农耕文明时代的保守性的文化传统,对所有的民族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极其艰难与漫长的历史过程。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